

HUNAN
WENSHI

湖南文史

39
1990/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
39
辑

湖南文史

周谷城题

湖南文史杂志社

湖南文史 HUNAN WENSHI 第39辑

编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编/田伏隆

副主编/丁江 高原

责任编辑/彭德才

出版/湖南文史杂志社(长沙市迎宾路15号)

发行/湖南文史杂志社发行部

印刷/湖南省政协机关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长广准字第0152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5 字数180,000

版次/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长沙第1次印刷

国内统一刊号/CN43—1175

定价/2.50元

- 顾 问 李炎生 吴立民
李 维 陈均元
刘晴波
- 主 编 叶伏苓
- 副 主 编 丁 江 陈 原
- 责任编辑 彭德才

目 录

(总第38辑)

· 革 命 史 话 ·

- 回忆我与毛泽东交往二三事 贺培真 (1)
同窗五载如兄弟——重洋远隔心相连——患难与共度难关
- 刘少奇和我家的交往 洪克宗 (6)
攻读洪家——海外友谊——营救少奇——“永远活在我们
的心中”
- 记谢觉哉我乡召开林业座谈会 吴岂凡 (12)
- 忆罗荣恒的故我行 刘燕南 (16)
- 回忆解放前夕衡阳统战工作二三事 刘国安 卢其超 (21)
- 钻心战术话当年
——回忆我和姜亚勋的一段革命经历 梅可华 (29)
- 智取遵义城 朱水秋 (33)

· 抗 日 烽 火 ·

- 在抗战胜利的日子里 郑洞国 (37)

从印度凯旋而归——胜利的曙光——狂喜的日子——上海人民夹道欢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冈村宁次的丑态

忆张治中在湖南致力于民众组训二三事………刘树鹏（42）

肖山令与南京保卫战……………郑绍周（44）

在宪兵司令部——南京保卫战总指挥——下关喋血——自杀殉国

长沙大火纪实……………许权（49）

蒋介石面授机宜——混乱的省会——纵火计划——火烧长沙——祸首是谁

我在“中国驻印军”中……………黄维新（57）

空运到汀江机场——兰姆珈训练二三事——三千华军保卫加尔各答——参加密支那围攻战——八莫截击战和克底克解围

望城沦陷时……………张超（71）

日寇犯境——罪恶累累——奋起反抗

临湘沦陷时期日伪政权机构内幕……………姚楚湘（85）

我当维持会长的回忆……………张修远（92）

· 湖籍国民党将领 ·

赵恒惕的军政生涯……………凌霄九（95）

青少年时期——辛亥革命前后——护国、护法战争——

驱张后的斗争——“援鄂战争”——当选“民选”省长
——谭赵之战——辞职下台——在省议会期间

回忆贺耀祖 周千贞(113)

略记先父何际元 何衡生(123)

接受新思想——参加国民革命军——抗日立功——密谋起义——湘中纵队——“丹心一点任浮沉”

· 住 事 钩 沉 ·

湖南省宪时期的选举戏法 赵 恒(134)

湖南援鄂之役 方鼎英(137)

北伐前夕国民政府派员联唐侧记 张季任(140)

我所认识的几位长沙市长 易甲瀛(143)

王力航——梁霖——王秉丞——李毓九——汪浩——蒋琨
——陈迪光——任建鹏——吴博夫

· 民 族 史 料 ·

民国年间湘西苗民“革屯”斗争 伍新福(177)

“苗防屯政”——民国初年的反抗斗争——大革命时期的
“抗租”、“反屯”——“永绥事变”和“革屯”运动的
兴起——“革屯”武装起义及其发展——“废屯升科”和
“革屯”军受编抗日

· 工 商 经 济 ·

- 外国洋行在长沙的经济掠夺 罗立德(191)
长沙开埠的历史背景——洋行操纵着长沙市场——洋行成了历史的陈迹
- 回忆湖南省政府员工消费合作社 谢庆利(200)
- 浏阳花炮古今谈 汤万全 杨敬德(204)
- 中美药号与益阳西药业 张永年(208)

· 社 会 生 活 ·

- 衡阳市的“丐帮” 周沛(210)
- 桃花江的迷信活动 刘建纲(216)
- 澧县禁烟见闻 郭德山(225)

· 台 岛 追 忆 ·

- 湖南花鼓在台湾 唐友邦(228)
- 回忆“台湾军校” 杨异撰(232)

回忆我与毛泽东交友二三事

贺培真*

我自1913年春与毛泽东同学起，与他的友谊达60年之久。现将其中二三事回忆如下。

1913年春，我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恰与毛泽东一起同在新生第一班，我们一见如故，意气相投。第四师范学校不久合并到第一师范学校，我们恰好又一同被编入第八班，同窗研读，朝夕相处，长达5年半之久。

一、同窗五载如兄弟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我与毛泽东都爱好体育运动，是运动场上的一对健儿。毛泽东在“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支配下，对各项体育运动都爱好。冷水浴、日光浴、风浴、雨浴、游泳、登山、体操等活动，样样皆能。而我只偏爱个别项目。毛泽东有意邀我一起参加踏雪、游泳、泛舟等活动。他对我只偏爱某一两个项目，深感遗憾，并多次进行耐心的启发和规劝，曾对我说：“你有锻炼的兴趣，这是可贵的，但不要只偏重一两项，搞畸形发展，还应该懂得运动的目的，

* 贺培真原名贺果，为音乐家贺绿汀之兄，邵东槎江人，是毛泽东的同班好友。

是为了增强体质，以便有充沛的精力去搞好学习，担负起改造社会的大任。”

读三年级那年，我的爱好转到了足球方面，并且很快表现出特长，跑得快、跳得高、动作灵敏，成为湖南第一师范最出色的足球运动员。1916年前后，远东运动会中国预备会在上海举行。湖南选派7名代表参加，其中第一师范占了3名：我和陈绍修（赞周）、彭道良（则厚）。我们3人在长沙大西门外码头搭乘轮船赴上海，那天晚上10点钟启航前夕毛泽东匆匆赶来，在船上找到我们3人，送来一部《红楼梦》，让我们在船上好消磨时间。第一次长途旅行，大家没有经验，未曾想到在旅途中会闲得发慌的，而毛泽东却体贴入微地替我们想到了。我接过《红楼梦》，心情非常激动。毛泽东就是这样赢得了众多同学的敬佩和信赖，与大家建立了纯真的友谊。

1917年中秋节晚上，毛泽东邀集了10多个同学去水陆洲泛舟。在铜园局附近雇了两只小船，绕过水陆洲，又从北头逆流而上。是夜皓月当空，清光万里，大家谈笑风生。船行不久，毛泽东提议背诵唐诗中的诗句，要求每句含一个“月”字，看谁背的多。我记起了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其中含有“月”字的诗句不少。我便与张昆弟、罗学瓒、陈绍修等人竞相背诵起来：“海上明月共潮声”，“何处春江无明月”……。琅琅诵读，阵阵笑语，与欸乃的桨声，和谐地融汇在一起。

船到水陆洲南头，毛泽东和大家下船后就露宿在沙滩上。大地作床，青天作帐，卧听湘江波涛声，不知东方之既白。

1920年9月26日，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仍回忆起这次快乐的中秋之夜，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是旧历中秋，去年今日已到上海，前年今日却在保定，再前年今日却在长沙。是晚还作环水陆洲舟游，同船10余人，尽乐而归……。”

二、重洋远隔心相连

1918年秋，我在第一师范毕业以后，虽想继续升学，但由于家庭经济贫困，只好作罢。恰巧这时，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正切合我的心愿。毛泽东知道我求知欲强，想继续升学，便把赴法勤工俭学的事通知了我。我接到通知后，便向长沙一个同乡借60元钱作旅费，和李维汉、李林、张昆弟等20多人一起来到北京。毛泽东帮助我们到保定育德中学赴法预备班学习。我在保定学习一年，每月3元钱的伙食费都是毛泽东、蔡和森到华法教育会要求解决的。伙食费有时接济不上，我只好去买烧饼充饥。保定冬天比湖南冷得多，滴水成冰。我缺衣少食，便和几个同学用棉被取暖。毛泽东支持和鼓励我们战胜了种种艰难困苦。我们与毛泽东之间不仅书信来往频繁，毛泽东还特地从北京来保定商量、处理赴法的具体事宜，看望同学、朋友，畅谈人生理想、革命道路，大家还一起摄影留念。

1919年冬，我们在毛泽东的帮助下，远涉重洋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利用报刊与我们这些身处异域它乡、远隔千山万水的游子保持着友好联系。

我们在法国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接受新事物，投身革命洪流。我与李维汉、李林、张昆弟、李富春等人发起组织工学世界社（前身叫工学励进会），我还是工学世界通讯社的成员，积极参加了蒙达尼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讨论。还从工学主义思想出发积极参与了“改造中国者——回国后怎样做？”这样实际问题的讨论。当毛泽东知道工学世界社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后，曾高兴地说：“我们总要有主义地进行，在法同学组织的工学世界社——革命团体——那办法很好”。

当时，毛泽东正在湖南进行革命活动，创办《湘江评论》，驱张（敬尧）反赵（恒惕），形势大好。毛泽东没有忘记告诉昔日的同窗好友，他应罗学瓒寄报的要求，把刊登这些消息的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寄给在法国的同学，使我们能经常了解祖国的革命形势，从中得到鼓舞。

毛泽东不仅利用自己创办的《湘江评论》刊登赴法同学写的通讯稿件，《湘江评论》被迫停刊以后，还向湖南《大公报》等报刊推荐发表留法同学的文章。1920年10月29日，我在法国哈佛柳工厂写了一篇《我做工的思想》，经罗学瓒转寄毛泽东。毛泽东收到这篇文章后，热情地向湖南《大公报》推荐，该报于1921年1月17日发表。一篇约2000字的文章，竟给加了200多字的“编者的话”，高度赞扬这篇文章是“一锤子一笔，一凿于一字”写成的。

三、患难与共度难关

在长期的战争年代里，我与毛泽东的联系时断时续。新中国诞生后，毛泽东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重任，我亦在自己的岗位上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着。建国初期，我出任贵阳市教育局长，是时即与毛泽东恢复了交往。在北京开会时，毛泽东多次单独接见过我，叙旧情，谈未来，同窗情谊依然如昔。第一次接见时，毛泽东风趣地说：“你还在，我以为你向阎王报到去了！”我向他汇报了在革命征途中经受的挫折，诉说了李立三执行错误路线时开除了我的党籍。毛泽东安慰我说：“开除了惕好，不然，你一定完了！”1953年，在党组织的关怀下，我这个1924年入党的老同志终于恢复了党籍，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毛泽东日理万机，仍然与老同学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

毛泽东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如实地向他汇报了贵阳市中小学教育工作情况。1952年12月5日，毛泽东亲笔回信：“贺果兄：惠书敬悉。告我以中小学情形，极为有益。我暂时不会出国，请放心……。”

1956年4月27日，毛泽东亲笔给我复信：“给我的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我情况还好，盼你保养身体，便时望将你的情况告我为盼……。”笃念旧交，情见乎辞。

1973年1月，“四人帮”猖狂肆虐。我将自己的危难处境，以及胞弟、音乐家贺绿汀身陷囹圄的情况，一一告知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我兄弟是十分了解的，他决定出面帮助。有一次，毛泽东当面责问张春桥：“贺绿汀怎么样了？不要整了吧！”结果在周恩来的具体过问下，终将贺绿汀从上海“四人帮”的监狱里救了出来。也是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我的一些不公正的对待才得以免除。当时我正在北京等候毛泽东的接见。我闻讯弟弟出狱了，顿时热泪纵横，无法控制自己。这时，我非常想见到毛泽东，表达无限的感激之情，也非常想见到在监狱呆了7年之久、备受摧残的弟弟。但我以为见毛泽东的机会还会有的，就赴上海去见弟弟贺绿汀去了。谁知，就此再也没有见到毛泽东了。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以后，我不顾耄耋之年，曾两次进京瞻仰毛泽东的遗容。一代伟人长眠了，留给我们以无限的仰慕与绵绵的思念。

（姜道友整理）

刘少奇和我家的交往

洪克宗*

我的父亲洪赓飏和刘少奇同志是同乡，又是同岁。少奇同志生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11月24日，比我父亲整整大一个月。他从12岁起就在我家设立的私塾读书，与我伯父和父亲同学两年，之后又一同读高小，一直到我父亲去世，两人没中断联系。

1925年12月16日，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职务的刘少奇同志由上海回湖南养病，被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逮捕。当时，我的父亲任湖南省禁烟局长（又名厘金局），也是政界中的一位有点名气的人物。他听到了这个消息，感到格外震惊，因为知道共产党人被逮捕的严重性。于是，与各方面人士配合，想了很多办法，费了很大力气，才把青年时代的好友少奇同志保释出狱。现在我把我的祖母及母亲所谈及的有关情况缕述如下。

一

我的老家原在宁乡县劳储乡洪家大屋，是一个封建的旧家庭。从高祖起，高中举人、进士、翰林者多人，且历任清朝京官及地方官员。

* 洪克宗，与刘少奇同岁，其家与少奇交往甚多

我的祖父只20多岁就去世了，留下了两个儿子——我的伯父洪迪光和我的父亲。伯母没生儿子，父亲就把三哥过继给伯父做儿子，我是第四子。

我出生在长沙市。到了6岁时，住在宁乡老家（洪家大屋）的祖母要我下乡伴三哥读书，当时保国民学校就设在我家中。我和三哥放了学就坐在祖母那红漆饰金的富丽堂皇的宁波床的大踏板上，听祖母讲故事，其中就听到了关于刘少奇同志青少年的一些情况。

祖母青年丧偶，她便把生的希望寄托在两个孩子的身上。当我父亲6岁的时候，祖母即聘请了老师在家课读。

杨毓群老先生是当时家乡一位非常有名的老师。他又名绍云，人们尊称为“绍云六公”。这位老师不但旧学根底很好，而且适应新潮流，读过一些翻译的外国经典名著，思想比较进步。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后，这样的老师确实是很少见的。一些人听说洪家聘请杨老先生专教自家的两个孩子，便纷纷要求送子弟入学。祖母都一一婉言谢绝。惟有炭子冲刘家要求送刘少奇来读书，祖母却欣然同意了。祖母说：“我第一次看见他，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欢喜。他衣着朴素，很有礼貌；谈话不多，年纪不大，却显得很懂事；我看他一定会读书，将来必定大有出息……”。

刘少奇原名渭璜，家住炭子冲，距我家约10里。为了读书方便，1911年到1912年间，十二三岁的少奇同志就住在我家。他对杨老先生十分尊敬，读书又十分用功，深为杨老先生所器重。由于杨老先生的辛勤教导，三个学生的学习都进步很快。而且他们以后也都认为杨老先生的教育使他们得益非浅，常常怀念这位好老师。

少奇就读我家，祖母就要我父亲照刘家排列的顺序称少奇为九哥，要少奇称我父亲为庶弟，称我伯父为长哥。而他和我

父亲也确实如亲兄弟一样，每天谈论学习，砥砺志行，食同桌，寝同床，朝夕相处，情同手足。两年之后，1913年（民国二年）少奇与我父亲同时考入县城玉潭学校。玉潭小学毕业后，两人又一道去长沙升学。少奇考入长郡中学（因收费较少），我父亲考入明德中学（当时两所学校都是湖南省会有名的学校）。之后，少奇于1919年在北京、保定等地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去了苏联。我父亲与他分别后，去日本东京进了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父亲在日本期间，两人还经常书信往返，没有中断联系。

1921年家父从日本回国，少奇同志也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通过少奇同志的介绍，家父与我母亲结婚。母亲姓袁，名素，字芷芗，出生于宁乡一个书香之家。由于外祖父思想开明，她得以到长沙、上海求学，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女师（与革命老人姜国仁同学，感情深厚，一直保持通讯联系）及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母亲文学基础很好，擅诗文，长于音乐，婚前是位教师，她是在上海与正投入革命洪流的少奇同志认识的。父亲从日本回来，开始步入政途，不论工作、生活，母亲对他的帮助都很大。两人结婚6年，生我兄弟4人。1928年我父因生腰痈，不幸病逝长沙。那时我才两岁。随后不久，我那伯父也不幸逝世了。

二

1925年12月，当时担任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的少奇同志领导了上海大罢工。因积劳成疾，回湖南养病。12月16日下午1时，少奇同志到贡院西街文化书社购书，入门不一刻，突来稽查二人、徒手兵一人，被扭往戒严司令部。赵恒惕下令将少奇同志逮捕入狱。

刘少奇同志被捕的消息经第二天的长沙《大公报》登载后，全国各地工会、团体纷纷通电援救，通电多的一天达40多份，刘少奇同志的亲友也纷纷营救。少奇同志被捕时，家父正在长沙任湖南省禁烟（鸦片烟）局局长，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设法营救。当时，家父还只27岁，风度翩翩，又是留洋归来，深为当道者所赏识，遂委以禁烟局长重任。省禁烟局先设洪江，后移长沙，专掌鸦片烟税收工作。为了押送税款，禁烟局还配备了武装。当时，大量鸦片从云、贵等省经湖南运往外地，洪江是个总关卡，税收不少，尽是白花花的银元。禁烟局是一个很为人羡慕的机关，当权者及大小军阀无不眼睁睁地注视着这个机关，而这里的收入却又无不为当权者攫夺而去。正由于这样，所以家父和当时官场中的头面人物来往很多，关系密切。

赵恒惕统治湖南好几年，是督军，又是省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握生杀予夺权柄。他下属的四个师长中，贺耀祖、叶开鑫二人都是宁乡人，且叶的军饷大都由我父亲直接拨给，所以关系不同寻常。另外，我的母亲因我父亲的关系也与赵恒惕、贺耀祖、叶开鑫的眷属有所接触，尤其是叶的太太和我的母亲关系更为密切，如我母亲若有几天未去她家，她就要派人来接去。少奇同志被捕后，由于我父亲一再拜托叶、贺，我母亲又奔走于叶、贺、赵之间，早晚探听消息，一直奔忙了一个月，再加上党的营救和社会上各条渠道的协同努力，少奇同志才在我父亲等具结担保的情况下，于1926年1月16日得以获释。

我父为支持和接济少奇同志读书、革命及保其出狱，用钱是经常的。光保划出狱那一次，就用了1000元左右。我父有一张乾隆皇帝的御笔字，价值600块银元，为了保划，这张字也送给叶开鑫了。父亲还在银楼订制了一套银餐具，叫周维宾送